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黎紫书《余生》微型小说的社会 和人性书写

**A Study Of Social And Human Nature Writing In Li Zi Shu's Flash
Fiction**

科目编号: ULSZ3094

学生姓名: 朱慧怡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 李树枝 师

呈交日期: 2018年3月30日

本论文习作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	1-3
第二节、研究背景	3-5
第三节、文献综述	6-7
第四节、研究方法	7-8
第五节、研究成果	8-9
第六节、论文架构	10
第二章 《余生》中的社会书写	11
第一节、社会百态的缩影：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11-14
第二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世俗标准对个体的冲击	14-17
第三节、当今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17-19

第三章 《余生》中的人性书写·····	20
第一节、目光温暖的投射：人性的光辉·····	21-24
第二节、冷却的心：人性中恶劣的元素·····	24-27
第四章 结论·····	28-30
参考文献·····	31-34

论黎紫书《余生》微型小说的社会
和人性书写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习作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习作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料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姓名：朱慧怡

学号：14ALB02400

日期：2018年3月30日

摘要

本论文主要探讨马华作者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余生》中的社会和人
性书写。微型小说具“速食小说”之称，素被文坛喻为不受待见的文体，被排
斥于主流文体之外。黎紫书却对此文体给予高度的重视，致力于微型小说的创
作，《余生》便是作者多年来潜心力作的成果。无论在技法或创作题材上，作
者始终不断尝试突破其书写的高度，然作者自觉江郎才尽，为表示对职业艺术
的负责而暂时搁浅该文体的创作。《余生》作为作者的自选集，集合了微型小
说创作生涯的价值成就，更能体现作者在微型创作上的功力及其关注的课题。
本论文针对里头的社会意识和人性现象，探看作者所要带出的蕴含。本论文采
用了社会历史批评去探析作者于《余生》书写中揭露的社会现实（包括人性的
现象），通过小说情景去把握作者生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从而发掘作者
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及对作者所要表达的蕴含作出人文性质的反思。其次也通
过心理批评法来分析社会书写中人际互动的心理层面，从中观看个体与社会环
境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亦采用文本批评法来解析作品里头的社会书写和人性书
写，以求探知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及贯穿小说整体的主旨与内涵。在人性
书写方面，本文又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来探索人伦关系中超越道德规范的伦理，
进而挖掘潜藏的人性之美。作者的社会和人性书写反映了现实普遍的情态，揭
示人的困境和问题，具启迪性质的作用。微型小说虽篇幅短小，但能承载丰富
的内容，体现极高的人文艺术价值，人们应给予此文体相对的重视。

关键词：黎紫书、《余生》、微型小说、社会书写、人性

致谢

谨此向笔者的毕业论文导师——李树枝教授献上万分的敬意和谢意。大一和大三期间分别上过李教授的“现当代文学”研讨课及“世界华文文学”选修课，见识了导师眼中的文学世界。李教授对文学推广的事业孜孜不倦，常邀同学出席文学专题的讲座，对马华文学也有相当的热忱。犹记得导师说过一句令笔者印象深刻的话：我们要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基于此，笔者在导师的推荐下选择了黎紫书的《余生》，入手研究此集和微型小说的价值，且从中获益匪浅。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有甜有苦，甜的是对题目专研的喜爱；苦的是时间的紧迫，在课程作业一并袭来的情况下笔者稍感压力，“能力差不是问题，但一定要用心完成每件事。”秉持着该信念，笔者得以顺利完成此毕业论文。另外，大学同窗亦是笔者完成论文的动力。从基础班升上大学部，笔者和同期系友在不知不觉中并肩走过近四年的大学岁月，个人希望自己可以与他们一同毕业，至始至终出现在同一幅画里。因而，在失去提笔动力的时刻，只要展望毕业的未来，笔者又重拾那一份信心。

在此感谢家人与友人的鼓励。母亲总提醒笔者注意健康，尽早休息。而弟弟也在期间与笔者分享动听的曲子，或寄予家乡的照片。家人贴心之举让笔者压力纾缓，欢乐地正视自己的路程。同时也感恩友人的理解，迁就笔者为专注于毕业论文的撰写而推辞她们出外的邀约，并给予鼓励和信任。最后，感恩自己完成了毕业论文，几分耕耘造就几分收获，愿自己不留遗憾。

第一章、绪论

本章分作六个小节介绍论文的研究动机、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论文架构。

第一节、研究动机

黎紫书（1971-）作为马来西亚土生土长和备受青睐的华人作家之一，在尚轻的年纪便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文学”的首奖，台湾中山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张锦忠将之同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及林幸谦等人齐誉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张锦忠，2000：209）黎紫书的独异之处在于黎不似黄等人拥有专业的留学背景，然却横扫马华和台湾多个文学奖项，以最年轻的黑马之姿勇闯马华前辈云集的文坛，其读者群已扩及台湾和中国大陆，近期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地出版的微型小说自选集《余生》更是作者多年在微型小说创作上呕心沥血的成果。

微型小说向来被排斥于主流文坛之外。相较于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微型小说被喻为不受主流作者、评论家或学者所待见的文类，如同黎紫书在《余生》的后记〈因为重要，所以不写〉中提到黄锦树在介绍黎的作品时以“其他不重要的作品”来概括微型小说集；黎紫书则以深切的目光注视微型小说，热衷且致力于该文体的创作，并称之为“写作生涯里相当重要的作品”。（黎紫书，2017：211）黎紫书对微型小说的重视促使她决心告别该文类的创作，因作者自觉无法突破现有作品的成就与价值。《余生》作为黎紫书

“告别微型小说创作的总结和回顾”，必有高度的文学实践和意义，促使笔者择此集入手来研究黎紫书重视的微型小说创作。

目前研究界趋向于黎紫书长篇或短篇小说研究的范畴，其中多以其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告别的年代》、《山瘟》、《天国之门》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例如黄熔的《披着女巫外衣的精灵——黎紫书小说创作主题研究》、林春美《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杨美娆《论黎紫书小说的儿童视角下的“丑父”形象》、薛芳芳《论黎紫书小说的三重色彩》，及朱崇科《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皆以作者的长篇小说切入探讨作品的历史、马共和女性书写不同题材的叙事，亦讨论人性、都市问题、弑父或厌母等伦理罪恶的主题。然而，黎紫书长篇小说对于人性的描述往往过于黑暗暴力，有别于微型小说冷静旁观的笔调，故笔者在探讨黎紫书的人性书写时将着重于人性的内涵及其背后引人省思的意味，而非作者的书写特色。

黄瑞颖的《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研究》与杨美娆的《论黎紫书小说的叙事伦理》对黎紫书的作品有更深层的主题阐释，然学者们仍以作者的长篇小说为探讨中心，以微型小说为中心的研究则相对甚少。黎紫书微型小说的创作风格有别于长篇或短篇小说，在主题上亦缺少后者宏观的叙事，更趋向于生活化的城市书写。研究界虽论及都市问题和人性相关的主题，但未深入剖析作者所带出的更具体的意涵，使微型小说在主题讨论上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另外，石晓枫的《书写本土与面向世界：论黎紫书小说》，张自春的《边缘的开放性：黎紫书论》，张颖的《从黎紫书的小说创作看新生代马华作家的

文化价值取向》和彭程的《从黎紫书创作看当代马华新生代文学观念的演进》皆讨论黎紫书创作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作者摆脱马华本土的传统色彩，以开放的立场书写离散、性爱等议题，突破历史、国族和身份认同等马华书写的框架。以上学者的研究共同指向了黎紫书面向世界的创作意识。

胡星灿学者的《边界超越与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亦以黎紫书微型小说超越本土的“世界意识”为论述中心，从作者的第三本微型小说集《简写》其中几篇的叙事语言和创作技法切入研究，然而论者对文本的剖析仅点到即止；金进的《日对魔镜幻化人生的阴暗女巫——马华女作家黎紫书小说研究》在论及作者微型小说的书写特点时也一笔带过，研究界可谓缺乏对黎紫书微型小说深入的文本阐释和研究。

基于研究界对微型小说文本的讨论尚存拓展的空间及该文类予作者有一定的价值，本论文便以作者的最新微型小说集《余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其中深层的社会和人性书写，并在此提出两道可引领研究方向的问题，即“作者的微型小说带出什么值得关注的信息？”及“作者如何带出信息？”。

第二节、研究背景

在速食时代的推动下，微型小说深受读者追捧，而在马华小众化的阅读圈内，黎紫书有意建筑微型小说的桥梁，接引更多非文学类的读者。（沈河西，2017）作者虽为马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然其写作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马华女作家”的身份背景。在张锦忠 2000 年的访问中，黎紫书表明自身缺乏书写南洋之身份、历史、国族等课题的使命感。（张锦忠，2000：208）作为远离祖

辈记忆的一代，黎紫书更关注的是跨越马华文坛的圈子，站在世界读者的角度去书写引发大众共鸣的主题，其微型小说的写作正剔除了长短篇小说的南洋元素，着重于更为普遍的题材——人的困境。

微型小说因篇幅的限制而具写作难度，如何在有限的字数内撑起丰富深刻的内容对黎紫书而言是耗费心思的考验。作者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后现代创作手法向读者展示“以小见大”的技巧，在微小的篇幅中承载庞大的信息和蕴含，引用陈芳明先生的观点，即“以最小的格局反映庞大的时代”（陈芳明，2017），此如同书中人物以微弱的力量展示他们生命的无限，效果极具张力，每个文字或标题都潜藏了一种可能性，故研究黎紫书的微型小说还需逐字细阅方能挖掘出背后携带的意涵。

所谓“文学即人学”，文学再现了社会生活，《余生》所映照的便是人性百态的社会。黎紫书将生活中的见闻通过文学形式的剪影，展示了日常微不足道的场景和普通人面临的困境，其中相似却各异的情境皆是社会成员共同面对的人生难题。文本内虚实交织的情节不免揭露了现实存在的生活片段，读者从中截取熟悉的部分来映照自己的人生，感受人物各式的处境和失落，诚如陈芳明先生对《余生》的评价。

书中故事带着我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过狭窄的街道小巷，让我们真实嗅闻到民间五味杂陈的气息。那才是人生，那才是残酷的现实。黎紫书写的可能不是小说，她仿佛是携带着摄影机为我们做实况转播，而且相当精准。

（陈芳明，2017）

黎紫书在成为全职作家前，曾在马来西亚最知名的“星洲日报”馆担任社会记者十余年，从而接触不少社会场面及底层人物，对其所处的环境也有胜于常人且客观的观察和认知。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黎紫书将之对新闻案件的感触和反思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卸下记者一职后，黎紫书到中国大陆生活，周遭的场景又为之提供不少丰富创新的素材，其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也反映到了作品里头，因而在《余生》的作品中，作者对现代社会普及性的议题和人性给予了深刻的关注，如人的处境和心境、爱恨情仇及人际关系的纠葛。作者宛如世态全知者，善于洞察小环境中被人忽视的细节，又善于捕抓小人物的心绪里一闪即逝的念头，将之放入文本加以平淡的语调述说。

黎紫书接触过众多命案和家庭悲剧，故而“死亡”和“家庭关系”又是《余生》社会书写中不停环绕的题材，其中不免投射了社会现实的阴影。作者坦言其对社会或人性的不信任是在从事新闻行业前便已建立的社会认知，记者的工作内容更是巩固其认知经验——现实终究回归于不可避免又无奈的局面（文坛开卷，2013a），因而作者笔下《余生》的篇章并无过多戏剧化的处理，人物情节往往回归到现实无奈的情境中，是为更贴近真实日常生活的写作。

黎紫书曾言：“我自觉无论我的小说用什么形式和文字说了什么故事，其内在其实都在为人性发出悲叹。”（张锦忠，2000：207）人性始终是贯穿于黎紫书不同文类作品中的课题，作者以不同叙事者的角度揭露和批判了人性的弱点，然也不乏彰显人性黑暗之对立面的情节。《余生》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作者不对角色的经历和行为作出主观的评价，仅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审视整个外在的社会乃至内在的人性。笔者将针对两者主要的书写内容深入探讨与研究，与作者一同思索文本背后重要的涵义。

第三节、文献综述

在作者背景的方面，笔者主要采集各专访提供的资料，如张锦忠《黎紫书访问记》谈论了作者与马华写作的关系；《文坛开卷》节目对黎紫书的专访内容分上下部分〈黎紫书(上)：马华文学的好声音〉和〈黎紫书(下)：解读《告别的时代》〉，从作者的背景经历至创作想法都有所触及；另有作者在澎湃新闻的专访《黎紫书：我希望标示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其中表达了作者对微型小说的看法，亦透露《余生》的创作背景。

对于作品的解析，本论文参考了陈芳明《以精简创造丰富——读黎紫书〈余生〉》一篇，陈先生以精辟和独到的见解对作品内容和创作手法进行了解析，使笔者更精准地了解作品的要旨。胡星灿学者的《边界超越与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一文则探析黎紫书如何透过微型小说“内容的解码化”和“人物的境遇化”拓展内容的普及性。笔者将借鉴此文对作者微型小说《简写》部分篇章的艺术手法之分析，以求更好地把握收入《余生》的相关作品的内涵。

凌焕新《微型小说艺术探微》2000年出版自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微型小说的创作特色，加深笔者对此文体艺术的认知。丁兴祥、李美枝、陈皎眉 1991年由国立空中大学出版抑或 Elliot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 于 1995年自扬智文化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及张春兴 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在社会对个人角色与规范的影响、从众心理等社会心理方面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姚鹤鸣于 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的《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

中〈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一节综合对人性之不同观念展开讨论，并详尽指出各观点的成立要素，得出人性的内涵应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论。肖四新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一书对人性的追问与反思令笔者把握人性善恶的内涵。

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社会历史批评和文本批评法，次要采用心理批评及文学伦理学批评法来研究黎紫书《余生》中的社会和人性的书写，通过各批评方式的结合，取长补短，以求较为全面地探析作品内容。

社会历史批评着重于作品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当中包括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笔者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来探析作者于《余生》书写中揭露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现象，通过小说情景去把握作者生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从而发掘作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及对作者所要表达的蕴含作出人文性质的反思。

《余生》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作者对真实社会的体察不无投射到了文本中，小说里亲子间的疏离和男女情感的复杂皆有当今社会的影子，亦是作者从生活中取材的产物。

笔者亦通过文本批评法来解析作品里头的社会书写和人性书写，以求探知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及贯穿于小说整体的主旨和涵义。文本批评是研究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一环。此中，笔者以文本细阅法对作品作回溯性阅读，并对其中的语言结构进行阐释与分析，以把握整体作品的内涵。作者运用二元对立的结构来突显年轻和老年、生死、人性美丑等状态，揭示生活的境遇与无常，

突显了作者悲凉温暖的社会书写。作者为在较短的篇幅内叙述情节而大量使用隐喻手法，使文字和标题具有承载意涵的功能，起到暗示情节的作用。

心理批评法指运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文艺现象（王先霏、胡亚敏，2005：108），在此论文中主要用于解析社会书写里的人际互动心理，借此理解人物的社会行为和反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指向人类心理的社会文化内涵。文艺作品作为个人心灵活动的产物，之所以能挣脱时空的限制是因其蕴含了人类共同的精神事件。（王一川主编，2011：129）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而人格面具（*persona*）是较为重要的原型之一。人格面具指人为得到社会认同而扮演他人期望的角色，此人格非真实的自我，掩盖了自我本质。在文本中，人物为符合社会标准而摒弃自我，成了不自由体的存在。

笔者又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来分析人性书写方面的人伦关系，探索超越道德规范的人性之美。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从伦理的立场去解读和阐述作品，此批评深刻把握人性善恶共存的特点，主张择善弃恶。（王迪，2015：224）在文本中，人物陷入善恶抉择立场时选择偏向善的一方，实践了择善弃恶的伦理。此外，人性之美也在人物非正常关系中超越道德批评的尺度，升级到精神层面的伦理学范围。

第五节、研究成果

研究界趋向于探讨黎紫书长篇小说的写作风格或艺术特点，缺乏对微型小说文本深入的阐释和研究，故本论文着重于探讨文本的思想内涵。《余生》中各篇作为独立的文本和研究对象，拥有各别的价值与特色，应予以重视且深

入探究内在意涵，以把握作者在此文类创作上的成就。作者对“人”的高度关注驱使其敏锐察觉到现实中不足挂齿的小事件，将身边的生活情景带入文本，增强文本的逼真感也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线。笔者通过文本解读和研究挖掘出内部的深邃蕴含和浓重的社会意识。黎紫书的社会书写大多关注于小人物的现实处境，从亲情、爱情或职场境遇中不无彰显他们的困扰和生活情态。作者对人际关系也有高度敏感的体察，从亲子至情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互动情节表达了人相互牵扯和影响之关系。笔者切入此点深入探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考察到世俗标准对个体无可摆脱的冲击。作者的孤独意识也间接反映至文本里头，人物的孤独状况均有社会和时代的风貌，显示作者微型小说写实的特色。

《余生》的人性书写有别于大部分学者研究的长篇小说之中暴烈的叙事格调。在过去的众多作品中，黎紫书以幽冷暴力的风格来揭示人性的罪恶与黑暗，淋漓尽致地表现她对人性丑恶面向的藐视和居高临下审判的态度。在《余生》里头，作者反行其道、选择抽离文本并以旁观者的态度就事叙事，不刻意彰显人物的善恶且予以主观评论，摒弃了长篇小说人性书写的严厉批判者姿态。故此，《余生》的人性书写有着温暖平静的风格，且部分人物的抉择已超越道德评价的尺度，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无长篇小说中善恶显著的立场。作者轻描淡写地叙述情节，由读者自行挖掘其中的美好或阴暗。对于人性的光辉，作者借以光的意象渲染人性之美，通篇采用温暖的笔调形塑温柔的格调；对于人性恶劣的叙事，作者以平静的语气和技法的使用透露其对人性的失望之情，当中质询的意味也不言而喻。

第六节、论文架构

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简述此研究的方向与目的，其中包含研究动机、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论文架构。第二章和第三章为论文的研究成果，而第四章则是论文的结论。

本文第二章的内容以黎紫书微型小说《余生》中的社会书写为研究对象。第一节主要探讨《余生》各篇从不同叙述者的视角所呈现出各异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处境，从个亲情、个人生存和理想等不同的创作主题，通过外在的人物经历与内在思想活动去解开现代社会不易察觉却能引发共鸣的真实风貌。第二节则着重于讨论生存于社会中的个体与周遭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世俗价值观对成员造成的影响，也发掘社会成员之间的依附关系。第三节则探讨当今社会的问题，例如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社会工业化与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冲击下，人们的精神开始出现异化的现象。现代化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剧人们的孤独感，反映了人在社会的现实风貌。

本文第三章的内容探讨《余生》中的人性书写。在黎紫书的笔下，人性虽有种种的缺失和弱点，但也不乏由爱而生的光辉的一面。故本文第三章又分两个小节，分别探讨黎紫书对人性温暖之“善”意的书写及对人性丑陋之“恶”的揭示的书写。最后，本文结合所有的内容作出总结，并尝试在第四章结论的部分论及黎紫书微型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成就，即对“人”的关怀，或以微小文体展示丰富的蕴含，继而讨论其微型小说创作始终围绕同类主题的局限。

第二章、《余生》中的社会书写

微型小说具有当代性意识，所写之人和事件往往贴近现实生活，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矛盾。黎紫书的《余生》正是生活影像的提炼，以各种细节映出生活朴实的本相，书写逼真的内容引发读者之共鸣。微型小说的优势又在于以小见大的特质，以微小的格局反照时代的社会风貌。

胡星灿学者分析黎紫书在微型小说书写中透过对应现实的观照，模拟了各种人物的境遇，而非任意想象他们生存时所面临的情况，由此还原人物在境遇中的各种面向。（胡星灿，2017：81）黎紫书本人也表达过此想法，“我能够体会当事者的状态，把它写进小说是想要告诉我的读者，我了解这个人的困境。”

（丁杨，2013：11）作者正是透过犀利的社会观察，藉由各式人物的境况来揭示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在其社会书写中，作者从各式侧面的角度切入，书写的人物境遇集中了百态社会的缩影，又勾勒出个人与社会相扯的关系及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第一节、社会百态的缩影：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黎紫书笔下的年长者都不约而同落入相似——亲子疏离的境遇，从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存状态折射出社会普遍却经常被人忽视的现象。〈春满乾坤〉取自作者身在大陆的经历。她受邀出席朋友家里的团圆饭，然一年未见的家人忘却团圆饭的本意，造就不欢而散的尴尬局面。（韩松，2017）标题“春满乾坤”与内容不符，对此社会缩影形成极具张力的反讽——团圆饭的热闹竟是来自手足间的争吵。小说中，作者借由母亲的拿手菜“鲈鱼”这一细节摊开亲子关系变

味的真相。孩子的话题围绕在股市房屋，最终因意见不合起了争执，饭局也草率结束。从始至终无人尝出年菜非出自母亲之手，暗示孩子鲜少归家的事实，由此分辨不清家乡菜的味道，从味道的无异闻出无味的亲情，展示了以小见大的技法。

〈两难〉则从男性的角度正面观看男人介于母亲和妻子中间的境况，亦从侧面观看老年人的生存境遇。文中男人与哥哥相互推脱照顾母亲的责任，显示亲子疏离的关系。现实中，社会西化促使中华社会所提倡的孝道，即尊老养老的观念在年轻世代中式微，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趋向疏远，家庭关系的松弛也导致老年人生存处境的艰难。无家可归的母亲被哥哥扔在男人家门前，男人不得已收留了母亲。“母亲搬进来以后，这屋子似乎不再是温暖乡了。他的妻子一直板起脸孔，或常常说一些嘲弄和挑剔的话，似是千方百计要让他难堪。”（黎紫书，2017：83-84）婆媳不合已是当今社会的常态。据华人性格研究，现代媳妇不如传统规范般尊敬公婆；另一方面，公婆也会小心谨慎，避免冒犯媳妇而破坏儿子的婚姻。（吕俊甫，2014：290）鉴此母亲“从来没有抗议过什么”（黎紫书，2017：84）但夫妻二人对母亲的抗拒让其随时面临孤苦的危机。妻子甚至逼迫男人将母亲送入养老院，男人为此陷入道德伦理和情感“两难”的窘境。

〈人寰〉和〈这一生〉皆以女性生存状态为小说主题，利用女性的多重角色塑造她们刻苦的形象。在〈这一生〉中，作者采用纵向长时概括的叙述，凌焕新认为长时结构是微型小说中较为罕见但不失为出奇制胜的叙事方式，可见作者为微型创作之艺术作了开拓性尝试。（凌焕新，2000：115）作者截取女人作为媳妇，妻子和母亲三种角色的生活境遇，以省略，跳跃式情节道出女人一生角色跳转和境遇转变的历程，简约化的叙事蕴含着漫长的镜头。作者以雨之意象串

起女人忙碌的一生，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探看女人为生活奔波的心境，日记般的形式加深了质朴生活的画面感。女人的埋怨在漫长的雨中持续，可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不觉时光的流逝，映出小人物劳累但仍旧努力生活的境况。

微型小说在书写人物命运时须抓住人物性格的突出点，比如一个动作，既是人物全部生活和性格的有力说明，借此树起形象又典型的生活侧面。（徐丹汉，1983：42）〈人寰〉以“便如此开始。宽衣，解带，沾水，干，穿衣，扣纽。”（黎紫书，2017：61）一句开篇，经由女人照料父亲的一组动作突显她在生活处境里的坚韧。老人离世的同时她生下孩子，为另一个生命重复相似的动作。

她照旧翻动着谁的身体，忍受所有污秽和不堪。这一套动作多么自然，真不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最后，她挽起水桶和该扔掉的纸尿片，朝尿片上印着的泰迪熊瞥了一眼，便如此结束。（黎紫书，2017：63）

作者用白描手法和首尾呼应的情节展示女人耐劳的生存境遇，女人默默承受两个生命躯体的重量，女儿和母亲的角色也承载了生活的重量。此文以女人照料将死父亲为始，又以照料新生儿为终，角色动作贯穿始终，连环相扣，扣出生与死二元对立的间距，也扣成艺术结构的张力。

〈日复一日〉是现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以荒诞虚构的剧情带出小人物无力改变的日常及对生活的厌倦。文中的主角总在等待轻快铁时夹在孪生兄弟之间，甩脱不了日常相同的程序，在重复性极高又无聊的日子里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三人富含隐喻性，先于抵达的那位面容憔悴，神情疲惫，可视作年长的主角；尾随来的看似精神，但眼神迷茫空洞，恰似年少懵懂的主角。前者经历沧桑，故称许主角有意挣脱的勇气；后者尚未积淀足够的生活经验，故鄙视主角无用

的挣扎。主角虽厌倦每日无价值区分的命运，实则有反抗的权利，然这一切竟因最后几秒的怠惰和犹豫而错失改变的机遇，小人物再次陷落“日复一日”轮回的生存境遇。

〈余生〉颇有庄子梦蝶的意味，亦是引发大众共鸣的一篇。老余总在梦里遇见年轻时踌躇满志的自己，试图提醒他认清现实，因他终究抵不过现实环境的力量，变成阳台上虚无度日的老人，所谓的理想即是幻想。老余又怀疑自己活在年轻时的噩梦里，表征他曾害怕自己活成现今的模样，然现实总令人失望，老余年轻时的噩梦现形了，在此境遇中生存的小人物亦是无奈的。每当他梦见年轻的自己，便使劲睁开双眼，期望自己醒来时重返人生工作的阶段，而非禁锢于老年生活的“笼子”里。他经历过半载人生，自觉对年少无知的过去有责任，但更多的是惦念那充实又满怀抱负的日子，正是他对青春的眷恋促发他存活的意志，为生命注入生的气息。末尾医生反复告知老余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却秉着惊人的生命力存活至今。此境遇是多数人生的缩影，人们总感慨逝去的人生，渴望重新活在风光的岁月，以至对“生”有所执着。

第二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世俗标准对个体的冲击

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他者的注视构成基本的人际关系，此时世界化作他者的世界并掌握在他人手里，因他人的目光把自我变成客体或被评价的对象，使自我演示他人所期望的形象，个体因而失去存在的自由。（刘建军、段建军 1992：88-89）黎紫书的社会书写也应证了这项理论。

〈错体〉凭借吊轨的布局反观社会的价值观及长辈拟定的标准如何冲击孩子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建设。从荣格心理学“人格面具”¹的角度分析，男孩通过角色扮演²完美演绎模范生的形象，符合一群长辈对他的角色期待³。

对了，他根本就没有好朋友，妈妈说那些粗野的孩子少惹为妙，只要得到老师的信任便够了，妈妈说……他听妈妈的话，他文静内向、成绩好、干净整齐，妈妈和老师们都称赞他是一百分的好孩子，以后一定会上大学赚大钱。

（黎紫书，2017：135）

在社会学方面，人力资本论（Human Capital Theory）认为任何人只要投资孩子的教育，就能为孩子创造高价值的劳动力，进而走向带来幸福的财路。

（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2009：126）世俗的意识驱使母亲严格要求男孩的学业表现，忽略了他的社交需求和人格方面的建设，他变成无辜接受一切的当事者。据研究，现代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在社会立足的标准不再是仰赖家世或阶级，而是凭借个人能力求取职业和社会地位，此中“考试”便是学生在取得学历方面对他们客观评估的共同标准。（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2009：122-123）由此母亲相当重视他的成绩，他也谨记母亲寄予他获取第一名的期望。

为实现标准，意外身亡的他借用陈小光的身躯赴考。他虽符合好学生的形象标准，人格面具底下的内心却鄙视陈小光，也倦于角色扮演，显示世俗标准

¹人格面具一方源于社会期待和要求的指引，包括“该成为怎样的人”的要求标准；一方是受个人社会目标的影响。（范红霞，王霞，2011：88）在文中，男孩对于前者的要求扮演模范生的角色，在个人社会目标方面拥有连取佳绩的期望，但面具底下的他心灵疲惫。

²角色扮演（Role-playing）指个体依据社会中认可的社会规范适当表现角色行为。（张春兴，1994：604）

³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指社会成员按社会规范来要求某人扮好角色的心理。（张春兴，1994：604）

对个体人格发展和心灵的冲击。最终，他盯着试卷上的题目，无奈和悲伤的情绪由内而生，开始质问内心真实的自我：“为什么不能轻松一点；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呢？”（黎紫书，2017：136）作者通过此篇如实照见家长过度的期望对孩子形成的负担，孩子在家长的注视中失去自由。真实社会里学生为学业成绩自杀的事件不胜枚举，小男生在赴考前出车祸致死的情节可视作现实可循的变相。灵魂和肉体的分离预示着个体意愿和世俗期望的矛盾，构成作者对社会现象批判的形式。

<一致>集中表现个人从众心理和规范性社会影响⁴，乃世俗标准对个体的冲击。人作为群居动物，不免受社会环境影响。当个体违反世俗标准，将被其他社会成员视作异类排挤在外。文中的男人为获得社会归属感，努力地想活得跟别人一样，作者连续用了19个“也”字来表达他与社会的一致性关系。其中，他喂养和处理金鱼的方式和别人无异，遵循社会的一套行为模式，然而有只不死的鱼破坏男人与社会的一致性，与他人养鱼经验的不同使男人懊恼。

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社会成员的行为趋向“一致”的原因包括个体为避免“客观的自我知觉”（Objective self-awareness）⁵。这条鱼暗示男人自我知觉的心理，鱼的不一致等同于男人的不足，男人恐惧此不一致会切割他与社会的联系，为消除知觉效应便依世俗标准度日，然他最终害怕金鱼死去会消解日久以来的不一致，于是“他抓了抓头，有点担心此刻的害怕是不是异于寻常，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黎紫书，2017：94）留下玩味的结局。在荣格“人格面具”理

⁴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Behavior）：规范导致了从众行为。从众是为得到归属感，因人们不愿被忽略。（Elliot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1995：258）

⁵个体注意到自身言行的不足会产生不安感，他人的注视也让个体时刻鉴定自身言行的妥当，增加此知觉的效应。为避免这种知觉所引起的不安，社会行为的一致性便在与他人相同以求心安自在的情况下促成了。（丁兴祥、李美枝、陈皎眉编，1991：298）

论中，过分沉湎于角色扮演的个体会与天性相异化而陷入紧张的生活状态。

（戴杖斌 1999：26）可见男人过分认同面具角色，始终在“一致”的圈套里打转，世俗标准的不一致也周而复始地冲击了男人的情绪。

〈拖鞋〉藉由一双拖鞋反射出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差异所造成的情感冲突。人以类聚乃世俗普遍的原则，人在多数情况下难以接纳思想相背的人，并与之朝暮共处。故此，男人选择与价值观分歧的女伴分手。

他送别以后回到公寓里，脱鞋子的时候，才发觉在那么多鞋子当中，拖鞋分明是最容易脱掉的，他却脱得很费劲。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人们总会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把穿了八年的拖鞋扔掉。（黎紫书，2017：184）

男人的压力实非来自普通的拖鞋，而是人们的舆论和不解。世俗标准源自人们的习惯，而拖鞋象征人们不易摆脱的旧习，故也隐喻世俗标准对男人的冲击。现世社会存在着一种观念：相处多年的情侣将顺理成章地踏入婚姻的殿堂，乃对彼此青春负责的表现。反之，男人向交往八年的女友提出分手，打破情侣相处模式中约定俗成的标准，由此引发众人的质疑，讨个说服人心的说法，对男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以世俗标准衡量个体行为，在此产生冲突时，社会便开始怀疑个体的抉择，通过质问来破解群体迷思。男子在他者的注视下成了不自由的存在，他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形成了世俗标准对个体无法摆脱的冲击。

第三节、当今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继工业发展和都市现代化，社会生活满足了人们的感官，却未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富裕，造成人们内心的空虚与寂寞感。由于城市带有极大的流动性，人

际关系也附带极大的随遇性，造就都市社会冷漠的陌生人性格。（李俊国，2004：59）此不免加剧人们内心的距离，在人际中体味不到人情的都市人开始被无形的孤独感侵蚀，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表征。

黎紫书自言孤独感是其所有小说中不经意又撇不开的元素，在作者的观念中，无论个体和多少人聚合，与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人终究免不了孤独感，甚至不会因寻获伴侣而解决自身孤独感的问题，其小说里的人物也在此意识中敏感而自觉地处于孤独的状态。（丁杨，2013：11）因而，部分作品如〈回家〉、〈同居者〉、〈消失的赵露〉、〈交易〉、〈她•狗〉、〈苍老〉、〈事后烟〉的人物皆深陷人际失落的氛围，被层层孤寂所包围。

〈同居者〉描述一位单身女子从修水管的工人口中得知自己房屋的天花板上藏了另一个人，女子思索片刻后决定保持现状，与身份不明的“他者”过着同居生活。女子独居多年，每日下班后便将自已深锁于屋内，一个人看电视或吃饭，自觉唯有遭遇意外直至尸体发臭时，才有他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此景影射女子生活于被孤立的社会环境中。现代化的社会机制将人禁锢于特定的单位，人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在独自的空间里，脱离群体及人际互动的减少引发人内心的落寞，产生精神失态的当今社会问题。

女子因长期忍受孤独而沉浸于非正常的幻想中。从感知天花板住户的存在后，她性情大变，不时揣测对方是否偷窥她，每日也准备多一份餐点，预设对方参与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她脱离孤单的生活，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感，可见孤独的对人的情绪影响至深。作者以人物荒诞的生活状态来描绘城市女性远离社群导致精神异化的困境。女子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因而享受

被人窥视的生活状态，直至邻居道出真相，女子突感厌倦并考虑搬离住处。作者放大单身女子微妙的心理变化，从过程发掘上班族女性空虚的精神面貌，是为当今社会都市人难以摆脱的病症，搬家也只会导向恶性循环。

〈消失的赵露〉从人们对待科技的角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这阵子城里就酝酿着这股闷气，借酒浇愁的人突然暴增，自杀率骤升……也有人竭嘶底里地登高一呼：‘还我们赵露！’”（黎紫书，2017：130）当今社会崇尚的商业文明带来感官娱乐的同时还削弱人们对人情的感受力，人际隔阂与交流量的减少让人陷入孤独的状态。现实的沉闷让人无法应对，人们开始往网络世界探寻精神依附，陪谈女郎软件针对寂寞之人发挥作用，人们开始沉湎于交谈对象的美好，殊不知赵露只是个虚拟人物，随着软件的升级消失后，用户集体精神失控并作出非理性行为。作者借此抨击人们对科技运用无法自拔致成的精神异化。科技软件非但解决不了人们孤独感的问题，还剥削人们直面现实的意志，让人陷入精神失衡的困境，投射出当今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问题。

第三章、《余生》中的人性书写

所谓文学即人学，微型小说应给予人性高度的关注，作为此类文体的价值。它虽篇幅有限，但能承载深沉的内容，启迪读者对人性的思考。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姚鹤鸣，1998：89），故往往通过社交活动形象化地反映出来。

黎紫书的写作往往离不开以人为本的人性书写，她对人性课题具有深度刻意的挖掘意识。作者曾言人性始终是贯穿其书写的主题⁶，此书写对其而言触动最深，促使作者去探索无望又消极的人性黑暗面，甚至讨论人性的挣扎，故文本中人物陷入善恶抉择的局面。身为基督徒的作者不免为原罪观所影响，认为人性属于黑暗与罪恶，然此想法恰恰使其轻易地被现实中较为动人伟大之事感动得落泪，惊呼不堪的社会尚有与黑暗对立的人。（杨梅菊、孙思，2013）基于对人性负面悲观的见解，黎紫书笔下人物的温情反在显微镜的观测下显得格外动人，反射出人性亮眼的一面。

在过去的众多作品中，黎紫书以幽冷暴力的格调来描摹人性的黑暗与罪恶，淋漓尽致地表现她对人性与人类情感居高临下的判决和藐视。在《余生》里头，作者却选择站在平行的局外，不对人事采取审判的态度，而是就事叙事，将人性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然部分作品对人性的失望和批判意味仍不言而喻，促使读者去反思人际伦理的问题。

⁶ 阅自薛芳芳《论黎紫书小说的三重色彩》。（薛芳芳，2008：40）

第一节、目光温暖的投射：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爱是人的本能，爱本身的力量便是人性的润滑剂，赋予人性光辉的一面。人自出生以来便有爱人的能力，爱作为人先天性的特质，使人性以善为本，真善美由此成为人性最崇高的基准。在《余生》的不同篇数中，作者透过亲情或爱情的题型来表现人性美好的一面。

在〈赢家〉中，夫妻对彼此的态度体现人性最纯洁的本质，是作者对人类纯粹情感的精神向往。小说阐述妻子在二人的金婚纪念晚宴上坦诚三十年前故意放弃彩票的事，在心虚得接不下话之际，丈夫将手搭在妻子颤抖的手腕，安抚道：“还说什么呢，今晚不就是后来了么。”（黎紫书，2017：172），全文以丈夫温柔的话语告结，里头浓缩了丈夫对妻子无限的爱意与谅解，蕴含着他对妻子目光温暖的投射。微型小说注重结尾的艺术，此中作者运用“诗化”⁷处理结尾，对情节的自然收束令读者心头一暖，小说也余韵悠长。物质往往使人失去方向，爱能让人性回归最纯朴的状态，并超越一切物质带给人的富足感。此篇携带重要意涵：坐享荣华富贵无法成为真正的“赢家”，唯有用爱换取信任，方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人生最后的大赢家。

〈我妻〉写丈夫对妻子的钦佩与忠诚。初时丈夫不理解妻子坚持不讨好上司或接受家长贿赂的观念，而后趋向欣赏她正直的人格与朴素外表下不凡的内在，表征人格的升华。莎士比亚认为人须依靠自我的努力和外在“他者”的提携来激发内心的善，人性的美方能沿着爱所指引的方向前行。（肖四新，2003：166）可见，妻子对善的执念间接影响了丈夫，丈夫的人格伴随着她成长，开始认同

⁷诗化结尾淡出情节，不再有戏剧性的突转，更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韵的生发。（张峰、缪鑫平，2001：74）

过往不屑之美。纵使妻子的外形无法匹敌花枝招展的姐妹，然她内在崇高的价值取向使她跃身群花之魁，让丈夫温暖的目光只投射于她身上，轻易辨出她在人群中的身影。作者以对比手法强化妻子的光环，其在丈夫眼里宛若“发光的幽兰”，而幽兰的清香恰好与香水形成气味的对比，突显妻子廉洁高雅的人品。妻子的温柔让丈夫主动摒弃出轨的条件，为其坚守婚姻伦理的规范。小说同样以诗化式结尾示意丈夫对妻子的爱，含蓄隽永的意旨让读者感发人性的美好。微型小说注重文字的洗练，作者以诗意浅显的文字二次描述妻子的笑容“像一枚小石子投入镜似的湖面”或“像一朵浅浅的涟漪在湖面绽放”（黎紫书，2017：205-206），意境之美激发读者无尽的遐想。

〈耗〉则阐述妻子在面对病重而被情人抛弃的丈夫时，不计前嫌地履行妻子伦理的责任。当众人怂恿她弃丈夫不顾时，她出于对病患的怜悯与对丈夫的情义，默默照料起失踪多年的负心汉。从妻子半夜“惊醒”察看丈夫的行动可知其诚心对待自己的丈夫，目光依然温暖地投射到了丈夫身上。从伦理学的角度观看，妻子的宽容展示女性隐忍的灵魂，在善恶抉择中，她显然偏向善的一方，其伦理选择使之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从而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黎紫书受访时坦言自己对爱有着柏拉图式的定义，即与肉欲毫无牵扯的关系，彼此甚至不了解对方，但愿意成全对方。（文坛开卷，2013b）作者富有光泽的人性书写反映在她理想的爱情故事里。爱，予作者而言，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信仰，超越了一切外在的条件，根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在〈圆满〉一文中，作者不将笔锋聚焦于女子出轨的事迹，而是平实地叙述女子如何陪伴患病的情人度过生命末期。“两人仅仅是相互扶持着结伴旅行，无性”（黎紫书，2017：208），二人由性欲关系转向精神之恋，老夫妻似地享受最后共度的时光，也体

现了爱情本真的一面。在削去欲望的关系中，无论是女子陪伴老情人并牢记他的体贴，抑或情人感恩女子对他的付出，其中真挚的人性让这段恋情得以净化，最终随着旅程“圆满”地终结。本篇已超越道德评价的尺度，进入伦理学的范围。作者不去叩问女子出轨的劣迹，反之投以温暖的目光去理解女子和情人当时的处境，借助两人的关系反照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美好让爱超越了人际伦理的规范，人与人的内在情感也得到了衔接。〈阳光淡淡〉里的小男孩意外身亡后，不知情的印度男孩如往常般来到家门外询问小男孩的下落，作者运用人物“跨前一步”、“焦虑地抓住铁门”、“大声问”（黎紫书，2017：67）一系列的动作来呈现印度男孩的担忧。天真的妹妹亦道出全文最扣人心弦的一句话：“如果这哥哥也去游泳池，他一定会看见。”（黎紫书，2017：68）说明印度男孩对朋友诚挚的关注。他的善良给予失去儿子的家长一丝慰藉，此中跨越种族的情谊令读者为之动容。作者也运用阳光的意象来调和故事的温度，使一桩悲剧反而突显人情的可贵。

又如〈幸福时光〉中，继母在叙述者的父亲离世后选择外出独撑家里的经济，另一头照旧把房子打理得舒适温暖，默默陪伴叙述者并将之抚养成人。继母温暖的目光对应窗外的阳光，渗入叙述者的心房且让她突破内心的围墙，逐步接纳毫无血缘的继母，不经意识地改称“阿姨”为“妈妈”。继母无私的爱已超越亲情伦理的隔阂直通叙述者的内心，成为人性美的聚光点。作者擅于利用“光”来渲染人性美好的面向，因此意象贴近人性美好的特性。此处日光作为幸福的意象，透过被继母擦得明净的窗户把抽屉斟满，人性有了纯净之园方能让人感知幸福。

无论是〈死了一个理发师〉或〈唇语〉，人性的光辉致使叙述者得以去感怀人与人之间细腻的情感，理发师对手艺的爱惜亦作人性美的标志；师生间无多言语便心领神会的默契来自于对彼此的欣赏和认同，作者二人超越语言的沟通彰显质朴的人伦关系。人性的本质蕴含着对生命抗争的进取欲望（郭亚明，2006：266），〈海鸥之舞〉的一群盲者没有因为天生的残缺而怠懈，在舞台上认真卖力的演出非为博取掌声，只为舞出生命璀璨的力量。老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俨然将人性中值得称颂的光点推高至极，完美地演绎“余生”的宗旨。

第二节、冷却的心：人性中恶劣的元素

蒙田认为人总被各种情欲劫持，亦受物质所扰，以致人性滋生谬误。（肖四新，2003：168-169）虽说社会自古提倡道德思想，但人性随着社会发趋向败坏，人性的鄙陋也由单纯具体的形象内化为深层复杂的曲面。黎紫书的人性书写总不着痕迹地将笔端伸向人物内心活动微妙的变化。她不费笔墨去刻画人物的负面形象，而是如实地陈述故事，然小人物不齿的言语或思绪赤裸地暴露了人性恶劣的元素。

〈遗失〉讲述上班族漠视盲女的导盲犬被人盗走，旁观她成日等待宠物的归来。遗失，作为双关修辞用语，在表面上虚指女孩丢失导盲犬一事；深层实指城市人丧失情感和理性，道德风气的“遗失”引发人性恶劣的元素。微型小说标题常用双关手法来承载内容寓意，此中的双关已超越个别词语的修辞功能，作为谋篇布局表达核心内容的艺术手法。（凌焕新，2000：74）作者正是采用

语义双关⁸来陈述表面的故事情节，从中揭露男人麻木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揭发城市人偷盗和食狗肉的癖好，可谓一语三雕。

作者又以单线叙事带出中国社会理性匮乏的文化，虽人民呼吁中国禁食狗肉，但不受管制的狗肉贸易加剧了偷盗宠物的行为⁹，此事突显人类贪婪无休的欲望，乃人性恶劣的元素。偷盗者“遗失”道德，让女孩“遗失”了导盲犬。偷盗行为在当地已司空见惯，男人因而不为所动，“遗失”了本真自我的道德意识，故失去制止罪恶的勇气与正义，甚至在偷盗者望向他时匆忙转移视线，以沉默的态度回应事发过程。“这种人真叫人厌恶啊，他皱着眉离开公园……他想，幸好，自己从来不吃狗肉。”（黎紫书，2017：26）结尾以言简意赅的段落交代了导盲犬的去向，也不余力地批判男人冷却的心和自视甚高的心态，一盆冷水自当头浇下，读者因而措手不及，开始反思人性的卑劣。

<再一次送行>中年轻的男孩对伊人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定受众追捧的女孩会被友人优质的条件吸引，以肤浅的目光打量对方。为阻扰友人追求女孩，男孩不惜暴露女孩的隐私，试图损毁她的形象，人性中恶劣的元素一目了然。至此，剧情来一转折，女孩为救弱智的弟弟义无反顾地冲入火场，不幸烧毁半边脸。“‘你看她左边脸，烧成这样子，居然还有人要娶。’他的朋友啜一口饮料，再做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黎紫书，2017：96）友人幸灾乐祸地嘲讽往日心仪的对象。作者凭借人物表情外化内部人性，人性种种恶劣的元素压缩于“不以为然”的表情，显示友人缺乏同理心，对自身的态度也毫无自省。友人痴恋

⁸双关分为谐音双关、语义双关和对象双关。语义双关由词语的多义性及在特定语境中语义的多解性构成。（吴礼权，2008：30-32）

⁹详见<访谈：中国玉林狗肉节和吃狗肉引发的冲突>一文。（Shaojie Huang, 2015）

于女孩的美貌，从无心关注她的内在，拥有获得女孩以证明自身不凡的虚荣心。当女孩失去姣好的面容，友人态度转换，露出了丑恶的实相。

作者为伊人设定毁容的遭遇，不免鄙薄人们迷于外观的人性；也唯有卸下靓丽的外表，女孩的内部形象才能变得清晰壮观，让男孩意识到自己对女孩的不公，为此心生愧疚。作者通过男孩和友人二者的反应揭示了人性的内涵：人自古皆有好美之心，对丑陋面貌唾弃不已，无法以平等心看待个人或群体的差异。他们终究会被外观吸引而忽略内在本质，或以外象作为判定人格的标准，进而昭示人性普遍的弱点。

黎紫书对爱情的不信任源于作者在现实社会里所接触的爱情总包含许多人的私心及人性黑暗的心理要素。（文坛开卷，2013b）因而，她笔下的男女关系多停留在复杂现实的层面，成为人性书写的载体，其中较为明显的例子〈所有〉讲述女子使计报复出轨的男人。她搬出男人“所有”通奸的罪证以争取他“所有”的财产（其中包括最值钱的两套房子），势必让不忠的男人偿还她逝去的青春。“男人说真没想到你这么狠，还这么贪。她头也不回。都到这地步了，逼得人说这种你死我活的话。这是代价，他不懂吗？”（黎紫书，2017：203）在女子不留情面的反击下，其冷却的心化为一道幽暗的景观，尽收读者眼底。其中“你不仁则我不义”的心思便是作者所谓的私心，更是人性中较为恶劣的元素。人们普遍拥有计较得失的习性，因人终归是讲究利益的群体。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失人性之美，人们便原形毕露，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亦为自身利益的亏损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作者擅长以一物串起单线式的故事情节。〈我在〉一篇以照片一物勾勒出人们普遍拥有的虚荣心。“我”之所以介意父辈在历史照片中的缺席，并非出于对族群边缘化打包不平，而是为错失炫耀的资本感到遗憾。小人物冷却的心反而引出人性恶劣的元素。“要是当时镜头稍微往左移动 0.1 公分吧，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班上的同学，甚至是他的历史老师，喏，这是我爷爷，骑在他肩上的是我爸。”（黎紫书，2017：17）小人物的反应映射出他们追求历史存在感的心理。照片作为历史在场的证明，是参与重大史事的证据，可以表征人物身份地位的不同。为求这份光荣，年轻人参与各种集会，以自拍的方式适时在大人物前抢镜，然而他的照片有修饰伪造的痕迹。作者以戏谑的口吻讽刺无意了解政治真相的年轻人，突出年轻一代盲目跟风、无政治观念的虚荣心。

作者还善于运用强烈的叙事来揭露复杂幽微的人性。〈窗帘〉以日常生活物来反映人们善于捕风捉影的特性。主人公家原先没有挂窗帘的必要，却因对面搬来一对情侣而背负偷窥的罪名，挂上窗帘后又遭受歧视同性恋者的指控，从两者相反的角度直观生活中人性恶劣的元素。〈守望〉更是道尽人性的幽谷，男子为取得职业成就而丧失职业道德，成日偷窥对楼住户的日常生活。单身女子经常跨出窗外擦窗，危险之举不仅引发男子的兴致，还成为他提笔的动机。在写下不同版本的稿子后，男子终日等待女子失足坠楼成为事实的一日，“他必须等到事情发生，才能根据情况判断要把哪个稿子呈给老总。红衣女子终有失足的一日——这个他不太敢确定，却并非毫无把握。”（黎紫书，2017：38）其中所抱持的观看“好戏”及将他人性命视为人生赌注的心态令读者不寒而栗，惊叹人性已扭曲至阴暗复杂的地步。

第四章、结论

综上所述，黎紫书微型小说《余生》是社会和人性生活的写照。她写作的素材取自普通百姓生存的社会，故小说人物和情节有着现实的原型，处处再现真实百态的情景。在社会书写中，作者的笔触并无延生到上流阶级的社会，反而聚焦于小人物平凡无奇的生活。她细致观察到日常生活的各种面向，从不同情态的人物境遇发掘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如全知者深入他们的心理或思绪，探看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情感上的冲突。小人物对生活无力的状态、生与死的境况，或亲子疏离的情况，皆是社会现实稍纵即逝的缩影。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境遇中努力生存，虽无光彩的人生，骨子里却透着不平凡的生命力，让平淡的日子酝酿出动人的情节。

黎紫书曾任职的星洲报馆转述了其想法，她表示故事题材时而出自个人见闻，时而来自身边人的生活经历，并无意将之写成科幻小说，而是纳入一本贴近于真实世界剧情的小说。（星洲网，2011）作者正是通过一个个微小的镜头展示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使读者在不起眼的日常中发掘引人入胜的细节，还可从他们的生活方式挖掘出更多社会内涵、以小观大，比如世俗标准对个体的冲击，抑或现代人精神异化的问题。那些既熟悉又片面的情景承载了重大的社会命题，作者挑战微型小说承载量的意图和尝试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也运用各种技法如反讽、长时压缩、意识流、首尾呼应或隐喻，以艺术手法作为途径撑起大量的内容。

在人性书写方面，作者摒弃采取长篇小说里严厉批判者的姿态去彰显人性善恶，亦不对人物的是非行为作出道德主观的评价。她从故事中抽离，以旁观

者之姿陈述每一个故事，然读者可从叙事中解读作者的态度。作者是被人性之美感动了，以温暖的笔调书写人性光辉的一面。其中她运用诗化式结尾收束情节，使篇章余韵悠长，人性之美自然根植于人们心底。作者亦采用强烈之对比手法突显人物出众的灵魂，深化人性崇高的形象。她将细致温暖的目光投射于生活中纯朴的人伦关系，从他们的生命状态反射出人性的光泽。作者对“人”的关怀，如同笔下人物对他者的注视与关怀，拥有人情可贵的一面。

作者又对人丑陋的面向感到失望，从人物的心态或一物揭露许多人性恶劣的元素。她无意刻画人物的负面形象，反之轻描淡写地叙述他们的生活经验，人性的卑劣自各种细节昭然若揭。黎紫书的人性书写也有一定时代的特质，比如第一篇〈我在〉反映了技术时代的现象，照片经由修图的包装得以伪造不存在的“真相”，人物使用自拍神器争取存在感，借此反照现代人的虚荣心。又如〈所有〉书写现代男女关系的复杂，男人的不忠或女人对物质利益的侵夺都含有人性时代的黑暗。

尽管社会生活和人性尚未完善，黎紫书仍尝试带着圆融的目光去理解笔下不尽“圆满”的人物及生活。她不急于否定或苛责现实的种种缺陷，而是以理性思维看待世俗情态，并试图去理解人物在不同处境中的心思和状态。她的作品也引人深思：在这不“圆满”的世界，人类是否该做出一些改变，抑或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一切？《余生》蕴含了许多值得人们去关注和反思的课题，比如尊养父母、教育问题、自我实现、社会环境、科技的弊病等，在读者接受中具有启迪的作用。文学终归是为人文精神服务，自古小说百家的名著不无体现了社会人文精神。人文的内涵包括社会和人性的范围，始终是以人出发，关怀的对象也来自现实社会。作者的《余生》便是人文精神的产物，极力把“人”放

到了微型创作所提倡的核心位置，为作品创造丰富的价值，世俗的内蕴也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

《余生》的许多篇章拥有艺术性的突破。作者尝试在不同篇章运用不同技艺来撑起内容，然部分篇章的技法太过用力，僵硬的形式掩盖了内容，反而使作品失去弹性和活力，成为炫技的展示品，亦令读者无法确切掌握作品之内涵。另外，作者大部分的创作题材始终环绕于亲情或爱情，主题未见新意；在爱情主题上也终以男人出轨的样式现形，显示其微型小说创作的局限。

参考文献

一、书籍

1. 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 著；李茂兴、余伯泉译（1995），《社会心理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丁兴祥、李美枝、陈皎眉编（1991），《社会心理学》，台北：国立空中大学。
3. 郭亚明（2006），《心灵的守望与诗性的飞翔——新时期女性小说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李俊国（2004），《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黎紫书（2017），《余生》，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
6. 凌焕新（2000），《微型小说艺术探微》，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 刘建军、段建军（1992），《文学与生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8. 吕俊甫著；洪兰、梁若瑜译（2014），《华人性格研究》，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9. 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2009），《基础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社。
10.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1. 王一川主编（2011），《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2. 吴礼权（2008），《现代汉语修辞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3. 肖四新（2003），《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4. 姚鹤鸣（1998），《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5. 张春兴（1994），《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学术期刊

1. 张锦忠（2000），〈黎紫书访问记〉，《中外文学》，台北：国立台湾大学，2000年第29卷第4期，页204-211。

三、期刊论文

1. 戴杖斌（1999），〈荣格集体无意识述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大学，1999年第3期，页24-27。
2. 范红霞、王霞（2011），〈论人格面具及其教育意义〉，《教育研究》，北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1年第1期，页87-89。
3. 胡星灿（2017），〈边界超越与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华文文学》，广东：汕头大学，2017年第141期，页80-85。
4. 王迪（2015），〈文学伦理与道德批评〉，《时代文学（下半月）》，山东：山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第11期，页224-225。
5. 徐丹汉（1983），〈论微型小说的创作〉，《丽水师专学报》，浙江：丽水学院，1983年第3期，页40-46。

6. 薛芳芳（2008），〈论黎紫书小说的三重色彩〉，《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江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08年第1期，页36-40。
7. 张峰、缪鑫平（2001），〈陡转与诗化：微型小说结尾艺术论〉，《娄底师专学报》，湖南：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1年第3期，页72-75。

四、网路讯息

1. 文坛开卷（2013a），〈【文坛开卷】黎紫书（上）：马华文学的好声音（2）〉，《大佳资讯》，取自
http://www.dajianet.com/news/2013/0327/198669_2.shtml 浏览于2017年10月28日。
2. 文坛开卷（2013b），〈【文坛开卷】黎紫书（下）：解读《告别的时代》（2）〉，《大佳资讯》，取自
http://www.dajianet.com/news/2013/0410/198888_2.shtml 浏览于2017年10月28日。

五、报刊

1. Shaojie Huang（2015年6月19日），〈访谈：中国玉林狗肉节和吃狗肉引发的冲突〉，《纽约时报中文网》。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619/c18sino-li/>
2. 陈芳明（2017年6月20日），〈以精简创造丰富——读黎紫书《余生》〉，《南洋商报》。取自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70620/%E4%BB%A5%E7%B2%BE%E7%AE%80%E5%88%9B%E9%80%A0%E4%B8%B0%E5%AF%8Cbr-%E8%AF%BB%E9%BB%8E%E7%B4%AB%E4%B9%A6%E3%80%8A%E4%BD%99%E7%94%9F%E3%80%8B>

3. 丁杨（2013年5月8日），〈黎紫书：我的写作是出卖自己的经验〉，《中华读书报》。取自 http://epaper.gmw.cn/zhdsb/images/2013-05/08/11/2013050811_pdf.pdf
4. 韩松（2017年5月29日），〈明艺·报道：镜中黎紫书：从不如人意的世界里爬出去——「镜中书——关于小说与虚构的维度」讲座纪实〉，《明报新闻网》。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529/s00005/1495994590047
5. 沈河西（2017年10月9日），〈专访 | 黎紫书：我希望标示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澎湃新闻》。取自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2905
6. 星洲网（2011年12月21日），〈走近人类的内心世界·黎紫书把感情写进小说〉，《星洲网》。取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855557>
7. 杨梅菊、孙思（2013年5月13日），〈黎紫书：我不是唯美派作家〉，《国际先驱报导》。取自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513/207651_2.shtml